

**肖文評，《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497頁。**

肖文評的新著《白堠鄉的故事：地域史脈絡下的鄉村社會建構》一書，以長達四百年的時間為經，以人物活動為緯，對位於清遠河流域的粵東潮州府大埔縣白堠村進行了全景式的書寫，內容涉及宗族、士紳、賦役制度、市場、民間信仰、文化網絡等各個方面，將白堠村從歷史上的一個「盜鄉」到「仁鄉」的轉變過程以及「國家、地方精英與鄉村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互動關係」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是迄今為止村落史研究中時間跨度最長、探討最為細緻深入的成果之一。

作者在對白堠村進行了長達七年的實地調查和跟蹤觀察之後，搜集到了十分豐富的地方文獻，「計有文集五十余種，族譜十種，房譜五十多種，祭祀本、契約、碑刻、分家單、記事本等一批，總計字數近千萬」（頁17），這樣豐富的文獻發掘量在已知的村落研究中是絕不多見的。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批民間文獻的形成具有清晰的時間序列，為作者提供了自明中葉至當代這段較長歷史時期內「相對連續與完整的史料」，使得微觀社區的長時段研究成為可能。

中國鄉村社會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兩種趨勢，一是以人類學家為代表進行的村落民族志式的研究，一是以史學家為代表進行的以文獻資料為基礎的研究，前者對後者的發展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最早在中國另闢蹊徑去關注農民生活的當屬人類學者，他們通過細緻的田野調查記錄鄉村社會的生動場景，這其中的佼佼者費孝通以《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39)一書給當時要求「眼光向下」的中國史學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震撼之餘，史學工作者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鄉村社會，並開始反思微觀社區的研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揭示整個中國的發展動力的問題，也因此進行了「超越村落」的各種嘗試，他們開始關注宗族、基層市場、水利組織、文化網絡（包括祭祀圈、婚姻圈、水利圈等網絡模式）等等，而隨着研究視野的不斷拓展和所獲取資料的日益豐富，學者們越來越覺得要想達致對整個中國的理解，必須通過具體的區域研究來完成，而在這個方面取得顯著成果並有着良好的理論建構基礎的當屬「華南學派」的學者們。他們在長期的華南區域社會的研究實踐中，將人類

學、社會學等學科與史學整合，形成了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並提倡回到歷史現場去感受當時人的生活場景和思想狀況。在他們的筆下，歷史的主體是人而非事件和地域，因而即使是小到一村一鄉的研究，只要能夠展現當時的社會場景與人的精神狀況，區域的就不再只是地方的，而是整體的，這也要求研究者必須將區域置於整體的制度、經濟和文化發展脈絡之下。

肖文評的著作即是在這樣的學科背景和理論建構下完成的一部對於粵東鄉村社會研究的大作。

該書正文部份共分六章。第一章為導論，作者主要闡述了利用總體史的方法研究單個村莊的思路以及白堠村的地理概況和政區沿革。白堠村位於清遠河下游的一山間盆地中，處於閩粵交界地帶，明嘉靖以前是有名的「盜鄉」，然而至清中期儼然成為當地科舉之鄉，這個轉變也是作者研究的出發點。從中也可以看到，白堠村實為十幾個小村莊的總稱，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等同為當代農村區劃中的行政村建置。

第二章中作者以當地大姓楊氏入手透視白堠村由宋末至明末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早期有着畲瑤傳統、不受政府管轄的白堠村，經過了明中期的一系列動亂尤其是「張璉之亂」之後，被中央王朝納入了控制之下。而與張璉「飛龍國」政權關係密切的楊氏，先是在動亂中趁機削弱其他大姓，擴展本族勢力，後又在張璉被鎮壓之際，通過與幾個當權官員攀上關係而倖免於難，甚至還因此佔據了大量田地，為宗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動亂過後，深知文人影響的白堠宗族開始致力於科舉，並將科舉的成功視為擴大宗族勢力的正途，由此完成了鄉村教化和社會轉型。

由於史料的闕如，對於明正德以前歷史的闡述，作者更多地從民間傳說、故事着手，「將其置於地域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解讀」，分析故事文本背後隱藏的歷史意義，即白堠早期的畲瑤傳統及外來氏族與當地土著之間的鬥爭。而對於在明中期動亂中與賊寇關係密切的楊氏家族的文本，如族譜、地方文人著作等等，作者對此有十分精彩的辨析和考證，從而說明，很多關於家族早期歷史的回顧是地方士紳們精心編撰的結果。

第三章中作者闡述了明末清初白堠鄉村如何在長達60年的動亂情境下求得生存以及動亂過後鄉村的重建過程。明末的潮州地區先有崇禎年間的「五總之變」，後有土豪競起，都給白堠村帶來了衝擊。迨至清初，「反清復明」的多次鬥爭、鄭成功與清軍的拉鋸戰、三藩之亂等等，無不加劇了白堠地方的動盪。在地方統治勢力不斷變更的情況下，如何審時度勢，調試與各

勢力集團之間的關係成為鄉村自保的關鍵。而自明中期動亂後開始致力科舉的白堠村，此時有一批地方士紳開始崛起，他們在動盪中組織鄉兵，建立寨堡，在以武力抵抗外賊入侵的同時，還通過聯姻等手段加強與地方勢力集團之間的聯繫以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間。動亂過後，士紳們開始着手整頓鄉村秩序，以楊氏家族為例，他們積極參與科舉、建立宗祠、樹立鄉村道德典範，從而維持了鄉村社會的穩定和延續。

第四章以楊氏家族士紳楊之徐為中心，論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地方士紳的鄉村建設活動。明末清初的動亂過後，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休養生息」政策，白堠村在經濟恢復的同時，人口也大量增加，隨之而來的資源短缺引發了各族、各姓之間的爭奪與糾紛。而早自明中期開始就發揮重大作用的士紳階層，此時為了穩定鄉村秩序、增強各自宗族在當地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通過建祠堂、修族譜、立宗子、設嘗產等一系列敬宗收族的制度化建構，來加強對宗族的管理和控制，並大力推動教育事業發展，促進本族科舉的興盛，由此給白堠鄉村帶來了從習俗到觀念到信仰上的儒家化的文化轉變。而與文化上的潛移默化相對應的，則是當地開放「海禁」之後墟市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宗族的強勢介入。作為韓江流域通往泉州、漳州地區主要通道的白堠墟，在清初海外貿易合法化之後，依靠自身優良的地理優勢，商品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同時宗族在墟市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顯。大宗族在試圖壟斷墟市的同時，也要負責維護墟市的秩序，保證墟市的平穩發展。

就這樣，清初康雍時期白堠鄉村在經濟、文化上的一系列變遷，使得該村在清遠河流域迅速崛起，經過多年發展，至乾隆年間白堠在科舉、經濟方面的繁榮使得其成為了「地域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該書第五章即論述了這一過程。

第五章中作者還注意到社區內部各族姓之間的競爭和力量變化。在白堠崛起並逐步走向繁榮的過程裡，鄉村內部的人群生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原來的多姓雜居演變為一姓獨大的「支配性聚落」，至遲到康熙年間，白堠已形成了以楊、肖兩姓為核心的社區支配關係。而大宗族的士紳們憑藉自身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廣泛地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中，諸如編修縣志、救濟災荒、經營寺廟、捐助津渡、倡建茶亭等，有意塑造共同的社區意識和仁義形象。

綜觀全書，作者將楊氏家族的發展歷程與白堠的鄉村變遷緊密相連，從楊氏的活動入手，將白堠從一個具有畲瑤傳統的未開化之地演變成一個以大族士紳為主導的地域經濟、文化、行政中心的過程梳理得十分清楚。而在

這個演變過程中，士紳階層是促進白堠變遷的最為核心的力量，而「鄉村」也正是在士紳們的有意建構下才得以形成。

作者對翔實豐富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嚴謹細緻的梳理和考辨，顯示出很強的文獻解讀能力。竊以為，這也為作者進一步對白堠村的經濟發展、村落關係等方面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而從研究方法的實踐和鄉村社會長時段研究闕如的角度來說，肖文評這部著作無疑是以歷史人類學方法進行鄉村社會長時段研究的最為成功的範例之一。

徐爽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421頁。**

楊念群可謂學界中的「話題人物」，當年《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甫出，就引起熱論，這本作為其「三部曲」完結作的《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自2010年出版以來，各種爭議就在學界持續發酵，形成一陣討論熱潮。

本書以「江南」為書名，但區域研究絕不是本書的主旨。在導論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目的是探究清朝早期「滿人」和「漢人」之間如何在一種廣義上的「地人關係」基礎上建立起歷史意識的聯繫」（頁1）。也就是說，「江南」在本書中並非一個實在的地域概念，而是一種觀念，或者說存在於皇帝與士人頭腦中的想像（頁12）。

從這一論旨出發，作者在第一章分析了「殘山剩水」的意象在明末清初的背景中對於士人具有的特別意義。第二、三章繼續討論在政治鼎革背景下士人的轉型與選擇。「歸隱」的士人對地方教化形成了新的影響，而在清初的「經筵會講」中，士人與君王的教化關係相對明代發生了逆轉。如呂留良這樣的遺民領袖在生計與精神追求中尋找平衡，使其編纂的科舉時文批選隱然消解着清王朝的正統權威。第四、五章通過「文質之辨」討論康、雍、乾三代君王與士人關係的演變。第六章梳理「正統觀」的譜系，以此說明清代帝王如何修正「正統觀」的內涵，從而影響了清代士人描述歷史的方式。在